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人民日报編輯部

(活叶文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场叛乱战争，已经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们的可耻的失败，在西藏绝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现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继续。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说，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将采取赎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议论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有些外国人说：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们应该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

叛亂的平定，則是“武裝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希特勒”。這樣說的人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是各國的反動派，例如亞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艷和蔣介石（但是他並不贊成西藏獨立，而要求西藏歸順台灣）。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態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同帝國主義站在一邊，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數，在本國也是少數，但是他們控制着相當大量的宣傳機器，一時顯得頗為囂張。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亂是反動的，平定叛亂是正義的。社會主義各國人民一致支持中國人民對叛亂分子的鬥爭。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站在中國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數。他們包括各國的勞動人民，主張正義和進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對外國侵略外國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國干涉西藏，就等於贊成外國干涉印度尼西亞、錫蘭、柬埔寨、尼泊爾、伊拉克、古巴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內政，等於贊成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正義的聲音暫時沒有那批反中國的宣傳機器所造成的喧聲高。有些人感覺難過：好端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亂，豈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亂既然發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壞事就變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這次叛亂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將最終結束外國干涉西藏的歷史，這對於中印友好

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种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應該認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問題大嚷特嚷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会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人民日报編輯部按：在我們写好这篇評論以后，我們讀到了尼赫魯总理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講話。这篇講話的主要論点并没有超出四月二十七日講話的范圍。所以，我們沒有对这篇評論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魯先生从今年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底，在議會講西藏問題，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願望”，反对中国的所謂“武装干涉”。在四月二十七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报已經在四月三十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現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滯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間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絕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質上的障碍逐步消

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

法来处理了。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时，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們对于他們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們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們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們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証，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首先，我們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終止。”

尼赫魯所謂西藏的“停滯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沒有說明。但是，这正是全部問題的出发点。我們的討論必須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領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資料——全部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屬於三种領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貴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和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領地一部分屬於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負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領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負。其余的領地是农奴主的所謂“自营地”。在这种領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領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領主只給一小块（約占領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

地給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絕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領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剝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維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貸。大批农奴所欠的債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經欠了几百年的債。农奴不但沒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沒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須由領主准假。

西藏的貴族是世襲的。全西藏現在有貴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財產多少而定。大貴族約占貴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們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几千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終掌握在这些大貴族手中。貴族和农奴等級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見了貴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講話也要有一定的講法，不許講錯。貴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認為違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駭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無論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須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統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剝削。寺院內部也是等級森严，农奴出身的貧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剝削者。寺院內也設有各种刑具和牢獄，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殘酷的程度同其他农奴主沒

有两样。

大致說来，貴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屬於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樞，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間，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敗現象和內部斗爭。在达賴喇嘛周圍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級官員中，为了爭权夺利互相殘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賴喇嘛，并不是象尼赫魯所說的那樣，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經常把达賴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見强加于他，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賴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們知道，一八五五年，达賴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宮暴亡；随后，一八七五年，达賴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宮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統治者傾軋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殘酷了。一九二三年，班禪九世被迫終身逃亡內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獄中；同年，現在穆索里的达賴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賴而毒死；一九五〇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統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滯不前的，不但經濟衰敝，文化落后，連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絲毫也不“温



和”，絲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殘酷、野蛮的制度！

試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鬧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你們所宣傳的西藏的自治或“獨立”是誰的自治或獨立呢？你們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亂的失敗是誰的失敗呢？看起來，很多所謂“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們所同情的並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壓迫者、剝削者、殘殺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腦。在西藏的大農奴主剝出農奴的眼睛和心臟來的時候，這些同情專家不覺得是悲劇，不向這些農奴主要求溫和和人道。在這些大農奴主向駐守在自己國土上的人民解放軍舉行武力進攻的時候，在他們用野蛮的方法殘殺被他們俘虜的解放軍戰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時候，同情家們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這些農奴主能夠進行百年的游擊戰爭，也不向他們要求溫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軍對於這些堅持叛亂的豺狼由防禦轉入進攻的時候，也就是說，唯有在這個世界上最殘酷最野蛮的農奴制度由於武裝匪徒的叛亂的失敗而最後遭遇着危機的時候，一切什麼悲劇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獨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沖破了閘門一樣地泛濫起來了。由此可見，進行這種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於誤會以外，根本是最反動的農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農奴主的衛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敵人。也正因为這樣，這個梅特涅（註）式的反革命的“神聖同盟”才會把美國

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注) 克勒曼特·梅特涅从一八〇九到一八四八年先后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一八一五年俄国的沙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和普鲁士的国王为了共同镇压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神圣同盟”。后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参加了这个同盟。梅特涅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我們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許多肮脏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鲁自己的阴谋詭計，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經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在獄中所写的“自傳”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現很多誤解和偏見（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带着在資產階級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見”），但是他仍然承認，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說：“經濟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階級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階級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統治的特权階級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說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魯在这里說得很对。但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見解，或者是实际上沒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現在責备我們沒有能够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权階級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階級分析作为“頗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消，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階級，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魯的这个企图是我們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階級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問題，更談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絕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們已經說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騙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軍隊都是如

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赞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别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們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鲁在讨论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认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说来，他不但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绝大多数被剥削者和极少数剥削者混为一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认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负责，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说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错误。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大家记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与世隔绝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经讥笑我们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出

发，断言我們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历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确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誹謗，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階級領導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縛罢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才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証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結論，尼赫魯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为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劇”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蔣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規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该强烈得多。但是，据我們所知，尼赫魯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並沒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蔣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為他所講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和漢人是不同的。這就是說，漢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將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礙。西藏人和漢人不同，千真萬確。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維吾爾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國的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也都和漢人不同。在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政府面前，存在着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培養了各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並且在漢族人民中，特別是在漢族幹部、共產黨的漢族黨員和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中，認真地進行了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教育。我們採取了資本主義世界上沒有先例的辦法，在漢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雜居地區說服漢人，建立了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僮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西藏，為了爭取西藏上層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里，一直保存着原來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暫時不要進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謂達賴喇嘛聲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權利，那麼，那些叛國有據的反動分子早就會被逮捕懲處，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會拖延到現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對那些反動分子採取了如此仁至義盡的態度，甚至在拉薩叛亂爆發以後，甚至在知道達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部隊還是一直

等到叛匪向軍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经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讨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可能了。人民解放军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萨地区的叛乱，如果它愿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赖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正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问题始终是很慎重的，对于争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真执行，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纠纷和隔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剥削阶级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纠纷和隔阂，结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谊。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统治者和满洲统治者压迫过汉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统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

滿洲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占人口絕大多數並且是革命主力的漢人，現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員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現在不是去壓迫和剝削那裡的少數民族，而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在一起，幫助那裡的勞動人民從本民族的壓迫者、剝削者手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民主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起來的基礎。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漢族人員，包括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不但沒有騎在少數民族人民的頭上擺威風，相反，他們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一道，做少數民族人民的勤務員。他們常常不避艱險，同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同甘共苦，為他們的權利和幸福而鬥爭。這樣，各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以及各少數民族的一切愛國的、贊成改革的上中層分子，就同漢族的勞動人民聯合一致，象漢族人民一樣地推翻了他們本民族的上層反動分子的反動統治。這樣，各民族的糾紛和隔閡的根源就消滅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獲得了真正鞏固的基礎。這個過程，在內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寧夏、甘肅、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都已經實現了。在這個過程中，領導改革的人員都竭力團結各少數民族的贊成改革的各階層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間和改革以後都同他們保持密切的合作。誠然，不可能沒有鬥爭，而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族地區還曾經發生了武裝叛亂。但是，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過的，這些藏族地區的叛亂，正是由西藏的



反动分子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统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沒有受到变动，他們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揮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軍、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繼續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結。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沒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軍进驻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屢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們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諸君須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們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們、鞭打他們、挖出他們的眼睛的魔鬼是他們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們相信那些帮助他們劳动和治病、不取他們一針一綫的解放軍战士是他們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轉瞬之間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軍收繳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繳了叛匪的枪枝，收繳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們压迫得太惨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动帶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殘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繳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許多村庄的居民听說解放軍要来，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时向